

这一次全国又食言而肥。我女儿和她的小伙伴的书包没有减轻重量，而且随着读书的升级，书包是越背越重了。各种作业也是越来越多，多得到她现在已经比读一年级睡觉晚了两三个钟头，比读一年级更没有了玩的时间。自然，全国的小朋友都一样，都被“托儿”涮了一把。

谁在撒谎

在给第五次少代会的提案里，小朋友朱晓奕说：“嘉定区华亭中心学校六年级有不少小朋友每天乘公交车去上学。我们挤在公交车站，人小体弱，背着鼓鼓的书包，是弱势群体。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我们，除了给书包减负，也可以在公交车上设置挂书包的方便钩或红领巾专座。”

朱晓奕小朋友说的现象，并不是上海嘉定区特有，在中国的城市，街上汽车如流，车流旁就走着背着鼓鼓的书包的小学生，公交车上背着鼓鼓的书包的小学生被挤得跌跌撞撞，自行车的后座，也坐着小学生，背着鼓鼓的书包，这一切已让人司空见惯。从书包的重负，可以看见我们的孩子正在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孩子没有说错，孩子提议在公交车给他们设置个挂书包的钩，可是最根本的出路只能是让书包变得轻起来，让儿童的思想能自由地飞起来，让孩子弱小的肩膀能够担负得起学习的压力。

我曾背着我的女儿的书包和她走路回家，那一天太阳并不很辣，我生活的春城让我走出了一身汗。数数孩子的书包，当时她读三年级，课本、作业簿算起来有十多本，再加上课文必读、课课练、文具盒等，重量不轻。孩子们就背着这样的书包，风里来雨里去，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那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呀！

我有一个朋友移居澳大利亚的悉尼，他和妻子回国探亲，带着他们在悉尼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到我家来住几天。当时我的女儿在昆明一所小学也是读三年级。朋友的女儿和我的女儿有一段对话（那天几个大人都在场），我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

悉尼的小朋友：“你怎么不玩玩儿？咱们去拔花园里的草，要不玩卡通游戏？”

昆明的小朋友：“我要做作业，我的数学题还没做完。”

悉尼的小朋友：“我们不做作业。老师在游戏的时候才让我们做。”

昆明的小朋友：“你不考试吗？你在班上排名第几？”

悉尼的小朋友：“什么排名第几？”她完全不懂中国应试教育的东西。“我们还是去玩吧，你做完数学，我们去玩？”

昆明的小朋友：“我还要写作文，老师叫我们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悉尼的小朋友：“什么是有意义的？”

昆明的小朋友：“做好事。拾金不昧，帮助同学，他上课没带米达尺，借给他。”

悉尼的小朋友：“你拾到钱了？”

昆明的小朋友：“没有。我们班有的拾到了，还有个拾到手机，老师表扬了她。”

我写放学后帮助同学打扫包干区的卫生。”

悉尼的小朋友：“什么包干区？”

昆明的小朋友：“就是学校的操场，放学后要打扫。”

悉尼的小朋友：“你写你扫地？”

昆明的小朋友：“我写做好事。老师要我们写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班的同学都去做好事，我就帮助同学打扫包干区，那天没轮到我们组搞卫生，我帮同学做好事。”

悉尼的小朋友：“你写好作文，我们去玩？”

昆明的小朋友：“我还要弹钢琴。你不写作文？”

悉尼的小朋友：“不写做好事。老师让我们写爱玩的，我养了条鱼，它死了，我没法写，就写我哭了。”朋友和他的妻子一直在旁边充当翻译，朋友说，老师让小朋友自报题目写一段观察到的东西，她的女儿本来要写鱼是怎么吃东西，怎么繁殖小鱼的。悉尼的小朋友要写的都是自己愿意写的。

昆明的小朋友：“你们老师给你们的题目是什么？”

悉尼的小朋友：“没有题目。每个小朋友自己的题目。”

昆明的小朋友：“你们一星期写几篇？”

悉尼的小朋友：“不写。你要观察了，才写。”

昆明的小朋友：“你几天写完？我们今天老师布置，晚上写完，明天交给老师。”

”

悉尼的小朋友：“我要观察完才写。我们玩去吧？”

昆明的小朋友：“你怎么老是玩？你不做家庭作业？”

悉尼的小朋友：“没有家庭作业。”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女儿一定也有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她怎么对我说的？她竟然对我说：“爸爸，悉尼的小朋友当不了三好生，他们太贪玩了。”

儿童本来应该有儿童的童真和童趣，可是中国的儿童都表现得跟个小大人似的，这是中国人的欣慰抑或是中国人的悲哀？

我的一个同事被老师叫到学校去批评了一顿，原因是他的儿子在上计算机课时用磁铁把电脑的屏幕磁化了。学校不仅要他负责为电脑消磁，还要他教育儿子以后不准破坏公共财物。同事回来自然又把儿子教训了一顿。他问儿子为什么要破坏公共财物？儿子辩解说自己没想破坏公共财产，只是想看看用磁铁磁了电脑会发生什么变化？从动机上来说，我相信这个同事的儿子说的是真话。如果换个思维方法，我们还可以从这儿发现孩子追求知识的欲望，这也许是产生创造力的最原始的闪光，只是看你怎么样来引导。

可是老师是对的，中国的传统，老师是教育人的，学生是被教育的，这里没什么平等可言。我的同事不仅去学校为电脑做了消磁的工作，还硬逼着儿子写下份检查，承认自己破坏公共财物不对，保证以后不再犯了。

这真是可怕！我们逼着孩子从小就把别人想得很坏，让孩子学着整人（如有的老师组织学生集体羞辱差生），你不承认就搞逼供信，把不是你的思想强加给你，在中国的学校，分什么差生、优秀生，不就是这样思想在作祟吗？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在中国大陆自称炎黄子孙的人，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搞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今天已经是21世纪，我们还在

搞给优秀生加分，对差生处罚那一套，我们认为这是激发人上进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其实这正是违反人性的，这不仅对孩子是噩梦，对大人也是精神上的负担，对我们的民族，这真正是悲哀！

我的亲戚有个儿子读小学五年级，孩子爱打乒乓球。有一天老师对他说：“你要在比赛中打了冠军，就让你当乒乓球队长。”所谓的冠军就是打败六年级那个当乒乓球队队长的小朋友。

这个孩子听了老师的话，天天苦练，有一次比赛，终于打败了全校第一名的那个乒乓球队长。孩子去找老师，要求兑现让他当乒乓球队长的承诺。老师怎么办？老师没让孩子当乒乓球队长，还教训了孩子一顿。他把这个孩子的父母叫去，告诉他们孩子的思想意识有问题，争名争利，让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德育教育。

我们的学校难道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德育教育吗？我们是要孩子说真话、实话，还是要孩子说假话，搞阳奉阴违那一套？

孔子有个弟子叫曾子，有一次大人要出门，孩子哭，大人哄小孩说，你别哭，我们回来杀猪给你吃。后来大人回家，曾子就把猪杀了。曾子的老婆大惊，对曾子说：我那是哄哄小孩的话，你怎么当真了？曾子正色说：言而无信，何以教人？

我读大学的时候，听一位老师讲课，老师讲到中国历史分段的问题。老师说，关于中国什么时期进入封建社会，本来是个学术上的争论，可是郭沫若把他的文章送给毛主席看了，回来对大家说毛主席赞成他的观点。就这么一下，中国大学的课堂，中小学的教科书都把郭沫若的观点奉为正统，别人的观点都介绍不得。“文化大革命”中，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学校，发生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军宣队、工宣队领导来一锤定音。这位老师把这称作：“在我们国家，理论的权威敌不过权威的理论。”

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我所说的这位教授已经离开了人世。我懂他的思想，他是希望我们的学校有真正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可是我们今天做到了没有？

我不敢说教师们是否做到了畅所欲言，也不敢说我们的学生能够和老师平等地对话。我知道的是，在学校你是个老师，如果你和校长发生不同看法了，你不能不听校长的。在社会里，你是个下级，你不能不听上级的。你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你只能按上级的思想来想问题，走上级给你安排的道路，看上级的眼色办事。我们虽然有这样“家”、那样“家”，有研究员、有学者，大多都是领导讲话的注释者。领导的一段指示下来了，他们立刻蜂拥而上，为指示的正确性引经据典，发挥读后感和学习感。因此我们的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同是一样的专家学者，对同样的上级思想，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学问”。

正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体制，一旦问题发生了，蔓延起来就是灾难性的。要想纠正，往往要么是积重难返，要么是矫枉过正，总之是损失惨重。

有的报道和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写的文章，谈到学生的家庭作业时都说，美国的中小学生学习家庭作业很少，有时根本没有家庭作业，往往是学生们即使有那么一点儿作业，在课堂里也就做完了。中国大陆的中小学生在深夜十一二点还在做家庭作业的现象，令外国人诧异。

我们的习惯是从幼儿教育就开始了。

有一本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日本、中国和美国三种文化的学前学校》就美国、日本的有关人员观看中国幼儿园教育录像带后的感想写道：“老师过多地指导孩子们的玩耍，老师过多地限制和控制了孩子们的行动，孩子们独立自由地玩耍太少，孩子们活动的水平太被动、太克制、太驯服。”这本书还写道：“一位日本学前学校的管理人员评论，孩子们看起来是如此压抑，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发的。所有一切都强调，坐要笔直，要绝对肃静，站队要成直线。这让我想起旧时代日本的学校。”还是这本书写到另一位美国学前学校的老师的反应，这位老师是这样看的：“过分严密的管理，使得东方的幼儿园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军营，而不是一所学前学校。我认为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此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以致不惜以摧毁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如此重要的感知和身心发展的年纪。这个录像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的孩子被迫使按照固定的方式去搭积木，而不允许孩子们自然地或发挥想像力地去玩积木。他们被迫使像装配工人那样按照说明书去搭积木，这是根本违背玩积木的宗旨的。”

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位朋友说到他的小孩上幼儿园时，告诉我，澳大利亚的幼儿园孩子们可以爱怎么玩怎么玩，他的孩子把幼儿园里的一部小自行车拆散了，老师没有骂他，只是鼓励他又重新把小自行车装好。老师说他在拆自行车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些东西，这是很可贵的。

在西方人强调“孩子毕竟是孩子”，给孩子们自由的想像、让他们快乐地玩乐，真正寓教于乐的时候，中国人却以用严厉的管理把孩子制造成守纪律、服从控制的木偶而自豪。

为了塑造这样的木偶，我们的教育成了一种僵死的模式，用一次比一次难的考试来扼杀孩子的活力，让孩子为应付这些考试学的都是一时有用，一辈子没用的东西。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拼命给学生布置作业，拚命出难题、刁钻的题、古怪的题，让学生为此筋疲力尽，就成了考试选择能考高分的好学生的办法。学校为此把能在“现代科举”里中举的学生视为自己的宝贝、把教出“举人”的教师当作自己的品牌。

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国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得了不少奖项，可是我们忘记了，中国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那只能说明我们的应试教育是让人应付一时，看起来学的很多，创造性很少。一个人从小到大，老师给他灌输的“死知识”很多，让他工作后，能主动地为社会发挥创造性的很少。想一想吧，我们原来被老师灌输的“知识”，包括我们解答得最完美的刁钻的题、古怪的题，我们赖以获得各项奖的成绩，到走向社会，开始独立生活后，还有多少不被遗忘、不被束之高阁的？我们的父母辈走过这条路，我们自己又在走这条路，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生命，难道我们还要孩子们继续没有希望的走下去，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能解脱吗？

一个弱小的身躯，背着重重的书包，里面装满了老师布置的作业，有些题是越出得刁钻、出得古怪，出题的“教育家”就越以为荣。这就好比不断地给我们的孩子加担子，让他们在发育的阶段去挑成人也难以承受的重量。当他已经快累坏的时候，我们还一个劲地赞扬他聪明、智商高。

“孩子，你真棒！”我们就是这么来捧杀孩子的。

“孩子，下一个哈佛女孩就是你呀！”为此，我们给孩子出些什么手握冰块 15 分钟锻炼意志、父母每晚陪孩子打两小时的桥牌之类的怪招，生怕孩子没有成木偶，

生怕孩子没有走火入魔。可笑的是，开出这一个个药方（具说很灵，有让人人都能到美国去当名校女孩之妙）的“医生”，没有谁想到要革新我们的教育观念，要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这已经是中国人今天的心中之痛，这些开药方的“医生”们还要把“国粹”贩卖多久？

我们就这样来欣赏我们的作品，结果到作品长大后，一个活泼的生灵已经变成个残废，除了衣食锦绣、大腹便便到手了些功名利禄外，怎么能指望他去创造新世界，走出崭新的人生？

这真是中国的教育自作自受！

我们是给孩子加担子好还是给他减负好？这是一个为了眼前牺牲将来，还是为了将来不搞急功近利的问题。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想改革教育。他也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弊端。他说：中国的教育是死人教育。是以学生为敌的教育。不幸的是他搞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使教育混乱了一阵，而没有达到改革的目的。

当我们从混乱里走出来，回归秩序的时候，旧的东西也会卷土重来。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太过于把“文革”前的十七年想象得太美好。不言而喻，如果十七年真的是那么美好的话，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了。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进程中，教育始终是伴随着我们民族沉浮的。每隔一段时间，总会传出一阵要改革教育的呼声。远的不说了，就是给学生减负这个问题，就已经成了老生常谈。

记得最近的一次是两年以前，又是电视里报道，又是报刊上见文章，从教育部到各级教育机关，一级一级往下发文件，说是要给中小學生减负，好像要动真格的了。

看见这些，我也跟着被中国大陆的教育“涮”了一回。我没想到活了一大把年纪，竟然犯起幼儿园小朋友天真的毛病。我对女儿说：“乖乖，今天的电视说的多好，你和你的小伙伴很快不用背重重的书包啦，我明天就给你买个小点儿的，上级发了文件，要给你们减负。”

女儿笑了。她问：“爸爸，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你想想老师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对女儿说。

“老师可没这么对我们说起过。”女儿回答我。

“嗨，孩子，老师明天就会对你们说的，这可都是老师的领导讲的话，老师要听他们的。”

女儿点点头，她相信我。我相信管教育的官员。从上到下各级各部门都在信誓旦旦地发誓要给学生减负，而且一级一级往下传，没想到人人都在这其中扮演了个“托儿”的角色！

这一次全国又食言而肥。我女儿和她的小伙伴的书包没有减轻重量，而且随着读书的升级，书包是越背越重了。各种作业也是越来越多，多得到她现在已经比读一年级睡觉晚了两三个钟头，比读一年级更没有了玩的时间。自然，全国的小朋友都一样，都被“托儿”涮了一把。

一天和几个朋友坐在茶馆聊天，女儿打电话，要我别忘了回家时给她买个大一点儿的书包，她的书又增加了。就此大家的话题转到学生的压力上来。我说，我看

到女儿小小的年纪学习这么累，心里真不是滋味，前一段时间，听说要给学生减负，闹了一阵舆论，现在又没动静了。朋友说，你相信这些屁话？你太幼稚了！朋友们也有儿有女，他们说的，你信不信？

这天晚上回家，把书包交给女儿，我躺在床上失眠了。究竟是谁在撒谎？

作为家长，看见自己的孩子被作业和考试压弯了腰，压成了近视眼，压得睡不着安稳觉，你不心痛？你要是家长，你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轻轻松松地学习？可是你不敢呀！你试试“改革”一下会有什么后果？别人的孩子在做家庭作业，你让你的孩子去玩试试？别人的孩子为考试冲刺，你让你的孩子看电视、做游戏试试？老师让孩子做这样作业、那样作业，解你绞尽脑汁也不得其解的怪题、偏题，你告诉孩子，乖乖，别累啦，做这些没什么意义，咱们改玩别的吧试试？你胆敢这样尝试，你的孩子就玩儿完了！你的孩子会被当作“差生”，会被老师赶出教室，会勒令你把孩子领走，别再进学校的门。你的孩子还会被全世界没有，中国“独一无二”的考试淘汰。没能通过一级一级的考试，直到万众瞩目的“中国高考”，你的孩子还能找个工作做不？你还想指望孩子将来有功名利禄不？你还希不希望孩子“做大官、赚大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因此举国上下从进入 21 世纪就开始齐喊：“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负担！”善良的孩子们原以为从此终于可以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有着补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

时至今日，孩子们还是被骗了，骗他们的正是他们最尊敬的老师，是他们最亲爱的家长，是他们最信任的领导干部。孩子们的书包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是一天比一天背得更重，睡眠也是一天比一天睡得更少，自己也是一天比一天觉得更累了。

不信看看最近就所谓的减负对孩子们所作的抽样调查，除了小学生的压力比中学生稍轻一些外，初中阶段的孩子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不满意。初中生说：“压力大，没有自己生活的自由空间。”

问到业余时间的的生活，初中生回答：“没什么娱乐，就算有也参加不了！”

高中生就更悲哀了，他们绝大多数对自己的学习生活环境不满意。

“没有娱乐的空间和时间！”

“很多很多压力，来自各个方面。”

“太枯燥，时间太紧，没有时间考虑自己是否满意。”

“学习时间超重，娱乐时间不协调。”

“学习太难太苦，玩的东西太少。”

“两点一线+应试教育等于生活无趣味……”

这些就是读高中的孩子们的回答。

“现代科举”的升学竞争使学习压力不断加大，家长们望子成龙，老师和学校盼望高分来提高知名度，对素质教育理解的偏差，让各种为“赚银子”的艺术班、特长班蔚然成风，甚至吹进了幼儿园。孩子啊，你还涉世不深，不懂“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这样的国情，你就原谅我们做长辈和师长的大人吧，相信让你们挑重担是为你们好。当然信不信由你，可是做不做就由不得你了！

我的朋友、同事每每谈到高考就叹气。他们说，不是咱们心狠，非要折磨孩子不可，是你不得不狠心要孩子没日没夜的做作业、做练习题，为考试而学习。全国的孩子都这样，全国的父母也是一个样，中国教育让中国人空前地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了，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老师敢不敢“改革”一下试试玩儿？且不说老师身兼二职，既要教书又是家长，仅只要他教的学生有考试分数不好的，就会影响老师的工资、奖金和提级，久而久之还会影响他的名誉、影响他端饭碗，老师敢冒险为学生减负不？答案是明白无误的，老师要争当名师，就要义无反顾地把应试教育贯彻到底。

学校是靠“中考”和“高考”的升学率来赢得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所谓名校，说到底就是“现代科举”考得好、考出高分的学校。当了名校之长，名利都来了，不是名校之长就只能看别人的眼色，中国的校长谁还敢提倡给学生减负不？所以，校长是靠不住的。

那些主管教育的官员呢？用一句话总结，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就什么都明白了。上上下下是这么个体制，牵一而动其身，要是不从意识上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要是不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体制，谁要想在这种体制下给学生减负，就真正是蚍蜉撼树谈何易了！

说起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是一种悲哀。我们一边在陈旧的教育体制下压得喘不过气，一边怀疑应试教育的做法是不是对头，一边又要被迫不遗余力地维护旧教育体制。《红楼梦》里的贾政就是这么对贾宝玉恨铁不成钢的。

中国的教师、中国的校长、中国的公务员乃至各级官员，何曾又不是家长呢？我们已经麻木不仁了，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已经习惯于应试教育的模式，并且把它奉为经典，顶礼膜拜。谁要反对它，我们就会站出来和谁急，和谁拼命。

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我们都是这千百万的习惯势力中之一，我们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给孩子们增压增负的帮凶，不论你承不承认，这是事实。我们都撒谎，自欺欺人，不同的是撒谎者有个大小的区分罢了。

“救救孩子！”鲁迅将近一百年前发出的呼吁，今天还在震撼人心，我们该怎样救救孩子同时也救救我们自己的灵魂呢？